

評王作榮「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

李望如

一、從名詞混淆說起

我於美西版中國時報，發現王作榮先生大作：「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結論咬定：「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我們身處異邦，心懷故國，不能不對此振筆直書，加以剖析，訴諸輿論，尋個公道。

王文說：「即使在台灣，我們的經濟發展與富裕程度已超過了大約三十年前的現代國家，但在生活型態方面連我們自己都不好意思說我們是一個現代國家。」

這所謂「現代國家」，證其文末說的：「此所以全世界的落後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而真正進入現代國家的則屈指可數的道理。」當係指現代化國家。但現代國家五光十色，有現代化與非現代化之別，非現代化的叫做落後國家，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王文說：「但我們現在所追求的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則這當係指現代化即工業化。但工業化早出大毛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便已充分暴露，無論是古典或新型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或共產主義的工業化，在本質上都屬「物化人生」與「物化世界」，人變成機器工具。結果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固使人類享受奢華的物質文明，却帶來墮落的一面，甚且有毀滅的危機。世界著名學者哲人紛紛高呼如何探求新道路以謀補救，如羅素的：「世界新希望」及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等書，早有詳盡研討。

陳立夫先生在其「從根救起」一書中說：「

人們妄想利用科學之成果以遂私圖，個人主義因之發生，唯物思想大事提倡。同時一面誤信「科學萬能」以代替「上帝萬能」，於是道德觀念日益低落，宗教信仰隨之薄弱，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精神生活則日更貧乏，表面人類文明日有進展，實質人類末日，日趨接近。言之，人人憂慮，行之，人人無辦法，此種現象，普遍見諸各地，尤以富強之國家為甚。」

工業化與現代化不能混為一談，且看金耀基教授在其「現代化與世界問題」一文中說的：「大都把『現代化』、『工業化』或『開發』三詞看做同義字，其實這三者雖為一相關之現象，却不應混淆的。本狄克斯以『工業化』為經濟的與技術的變革，『現代化』則指所有社會與政治的變革，它是伴隨工業化而產生的。至於『開發』則指『經濟與技術』的變革和『社會與政治』的變革二者而言。說得最簡潔明瞭的還是艾不脫的定義，他以『開發』指一般的社會變革，『現代化』為『開發』的一個特殊情狀，而『工業化』則為『現代化』的一個特別面向。」

因此問題已非單純工業化或既成那類現代化模式，而是創造中國式的現代化新道路。這亦就是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所昭示的：「三民主義的「倫理、民主、科學」之路，決非王氏在咬定「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前提下所追求的工業化之路。

二、咬定「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

王文說：「不僅如此，更由於仍是一個落後的生活型態，又轉而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對於現代進步國家而言，始終盤旋在一種落後階段，無法上升。而連這一點的經濟發展，也甚至使我們無法消受，各種社會腐化現象之出現，對我們生存環境之威脅，每使人產生與其如此，寧願不要經濟發展的感嘆。」這並非事實，相信絕大多數都會讚美台灣的經濟發展，儘管仍有不足乃至若干不小缺點。不只全世界公認這是一種奇蹟，足以為範，連中共亦已不得不喊出：「經濟學台灣」。

王文說：「但是一個最基本的理由，則是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阻礙了國家的現代化，是中國文化不能使我們有進一步的發展，也是中國文化使我們不能享有現代化的生活。」王氏這種反傳統文化的老調，自清末民初以來已被狂喊，其最典型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以及後來中共的批孔。然而赤裸血淋的事實，證明這類崇洋迷洋思想的污腥已被時代考驗的巨浪洗滌，烟消雲散，甚且反過來推崇孔子。此全世界莫不皆然，在不勝枚舉例子中，姑舉幾則以見。

陳立夫先生在其所編「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一書中，曾引述美國現代歷史學家杜蘭博士說的：「欲治療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墮落，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產生之混亂，其有效之方，莫如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之薰陶。」

又如西方賴以現代化的十八世紀後半期的啓蒙運動，正是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遠

在十七世紀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茲已開研究中國哲理風氣。他曾說：「中國的實際哲學和政治道德，實勝吾輩，孔子學說對於公私生活，秩然有序，可謂已無餘憾。此種完美的政治哲學體系，得以出現於世界，使歐亞兩大文化互相補益，實為天幸，歐洲人均宜從中國學習人生的道理。」法國的啓蒙哲學家如盧梭、孟德斯鳩和伏爾泰都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尤其伏爾泰盛讚中國政治思想為世界最完美的思想代表，他曾說：「孔子開創一種人類的行為科學，這是一切科學的最偉大者，實行孔子之道是世界最有價值時期。」

我在拙作「最基本問題在那裏」中「論中華文化精神」一篇，引述過現代哲學家羅素於民國九年來華講學時說：「我已逐漸瞭解，白種人並非如我以前所認知的那麼重要，如歐洲人及美洲人在戰爭中死亡，並不能造成人類之滅亡或文化之結束，因為世界上仍有數量可觀之中國人存在。中國是我所見到的最偉大國家，中國之偉大，並非只是數量之偉大，而是在文化方面之偉大。並且，還有在智識方面也是最偉大的。我不知世界上另有一個國家其文化有如此之開通、真實、願於面對現實，而不硬縛於一個特殊典型。」我在拙作「白沙日記」中，引述羅素當年在京大講學以「東方問題」為題演講所說的警告和預言：「列強不可對中國干涉和壓迫過甚，否則物極必反，潛藏在中國人心裏的反抗力，可能使智識份子走向極端，逐漸變成狂熱的共產黨徒……但中國亦可能在另一方面，只須假以相當時間和良好環境，仍會回過頭來再孕育出以熔匯儒家仁愛倫理思想及西方民主觀念為基礎的新偉大文化。」這都在說明中國文化阻礙經濟發展，阻礙國家現代化之說決非事實。相反的，惟有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才能拯救國族，無論是促進中國式的現代化還是化解赤禍。

三、大數中國的家之罪

王文說：「所謂中國文化，由兩個基本因素構成：一個是以家為單位的基層社會組織，一個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生活，這兩者有互相依存關係，而政治組織與政治思想則是建立於這兩個支柱之上。」王氏說：「在家以內，個人要父慈子孝，兄弟弟恭，一生都要為家奉獻，個人幾乎不存在。」

王文說：「中國基層社會組織是家，沒有個人，個人被容納與溶化於家之中。」試問，父慈子孝，兄弟弟恭，有何不可，那一個社會能不需要？至於所謂「個人幾乎不存在，沒有個人。」更不知所云。儒家為人之道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以及「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均在說明個人是家及國的起點及原動力，是必然的合理程序。

王文說：「中國人參加社會組織是以家為單位來參加的。例如中國人的參加這個社會組織，常是一人得道，全家飛升，叫做裙帶關係。而一人得罪，常是全家受罰，所謂罪及妻子，有時還要誅九族。」這是專制時代的往事，決不能代表中國文化，它只屬渣滓部份，而王氏此語却分明以之代表中國文化，台灣今日仍如此。雖然所謂裙帶關係流毒未全消滅，但只剩極少數，已為法律及輿論所不容，王氏偏說成「常是」，常者，經常如此，大多數之意。「一人獲罪，常是全家受罰，有時還要誅九族。」今日台灣還有這種事嗎？

到底個人與家的真正意義及其關係如何，且看「大學」說的：「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

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個人修身是為了齊家，齊家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孝者所以事君也」，正是說行孝是為了進一步事君，君於今指國家，故說忠孝兩全，移孝作忠，忠臣出孝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同樣的，父慈不只是愛自己子女，而是須先在家養成慈心，出去治國平天下，才能仁慈愛民。如連自己的家，自己的子女都不慈愛，怎能仁慈愛民？故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以忠為首。陳立夫先生在其「從根救起」一書中更說：「揣其本而不忘其末，由近及遠，由小而大，由家而國，不離實際合乎科學」。所以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本立而道生」，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國父根據上述務本精神，將八德中之「孝」置於「仁愛」之前，以符合「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順序，其義易明。更將忠置於孝之前，以示國族觀念重於家族觀念，以符合古人教孝即所以教忠之義。

唐君毅先生對此亦有透徹精微的分析：「通常人說，儒家是以家庭為中心，這是錯的。因為儒家只說孝弟是仁之本，並不說孝弟是仁之全。孝弟為仁之本，只是說人之仁心之表現，首先只能向與我生命最接近之生命，如父母與兄弟上表現。而非要人之仁心限此。儒家之理想，亦非以國家為中心，或世界人類為中心。由是言之，我與父母是一關係，我與朋友是一關係，我與國是一關係，我與世界人類是一關係。各種關係，自其各為一種特殊關係，不可相代替而言，其重要性與價值，在原則上是平等的。在實踐上，則看我當前所處之地位或位份，正在某一關係中，便

以那一種關係之責任為我現在所當先盡。通常人總有一種錯覺，恆自外面去比較說，國比個人大，比家大，人應為國而打破家庭或犧牲個人一切。希特勒之徒，即為此理想所鼓舞，引起狂熱而挑起戰爭。於是人又想，世界人類比國大，人應為世界人類而犧牲家庭國家。許多共產黨之所以能心安理得，亦即在他想着他是為整個世界人類的未來幸福。但是自外比較大小的態度，其實並不能貫徹下去。如要貫徹下去，我們應說全宇宙之生物比人類大，為什麼我們不應為全宇宙的生物而犧牲人類？可見如此從外面去比較家國天下的大小，而主張為了國家，便當否定家庭，為了世界人類便當打破國家，實不合理。說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皆當念念不忘在世界人類或國家，當為之而犧牲家庭與個人一切，亦非仁者之言。只有儒家，在此同時能肯定家庭、國家、天下、與個人之關係，不自外看家國天下之大小，而自其皆只各為個人對羣體之一關係看，而視之為在原則上平等，不以任一關係凌駕其他，抹殺其他。

四、「無人願意遵守」又「到處可見」

王文說：「中國文化的另一個構成因素是農業……也阻礙了它的發展前途。」這與他對家的基本說法相似，但就指其阻礙經濟發展一點，我記起陳立夫先生曾說過：「家族制度與農業社會原為不可分者，一旦工業化，社會各種制度之自然調整，亦為不可避免者，惟欲全盤推翻此制，乃不可能者。試問過去若干年，台灣工業起飛，為世界之奇蹟，不亦產生於家族制度與農業社

會乎？有何阻礙之事實！至於大規模之工業經營，需要高級工業技術與管理，亦屬必需，惟應擴展家族觀念為國族觀念，正如國父之主張，而先總統 蔣公對新生活運動之提倡，亦所以補救此一缺點。」這正好簡要指出王氏這種說法之膚淺。

王文說：「由於以家為中心，於是在處理人際關係及物質生活方面，便偏重倫理、血緣、親情、人性，而忽視了法律、制度、契約、公平。」但大家都熟知，法律、制度等，必須先以倫理和人性為本，不能背此，法律、制度亦正是為保障倫理和人性而產生。說中國重視家和倫理人性就輕視法律和公平等，亦非事實。中國向來是「王法大如天」，「大義滅親」，最喜以「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公道自在人心」等教人。

王文說：「舊的家正在迅速解體中，維持舊的那套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也就失去了適用對象，無人願意遵守。但在另一方面，在那種舊文化中形成的不合現代生活需要的觀念與行為則到處可見。」這完全自相矛盾，既說「無人願意遵守」，又何來「到處可見」？更嚴重的是接着說：「維持舊的家那套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也就失去了適用的對象。」這明白是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一套傳統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它真的「失去了適用的對象」嗎？

王文說：「現代生活所要求的是嚴守法律與公平原則。現實社會則喜歡講人情，走門路，貪便宜。」現代生活所需求的是公私利益分明，每一個人不得因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現實社會則是公私不分，而經常為了私利損害公益。現代生活所要求的是服從團體，講求合作，互相配合。現實社會則是各自為政，互不相讓，互相傾軋。現代生活所要求的是貢獻與報酬相當

，權利與義務相對等，各取份內之財。現實社會則是只問報酬，不問貢獻；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千方百計奪取份外之財。現代生活講求公平競爭，冒險進取，追求成就。現實社會則是投機取巧，詐騙蒙奪，享受別人的成就。」

這所謂現實社會，明白是指今日台灣社會，而王氏上述的「到處可見」即指這五項病態，「到處可見」亦即為大多數。但是事實今日台灣決非如此不堪。因為王氏所指的病態，失德和不法，正是中國聖賢所口誅筆伐的，亦為今日台灣法律和輿論所不容的，政府和大多數人民所不許和不齒的，它只屬極少數敗類行為，如何能代表台灣社會和中國文化？而王氏所指的「現代生活」要求之如何理想，却正是多數為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所包括了的，多數是中國古今聖賢所諄諄教誨的準則，怎能說這些都是「現代生活」才該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欠缺這些東西，所有病態就代表中國文化，真是豈有此理！亦可以說，今日台灣如果真的如此不堪，亦就不會如王氏此文另外所說的：

「在過去三十年來，台灣在經濟上及技術方面，有重大的進步，生產型態亦由農業轉變為工業。」更不會有舉世公認的台灣出現經濟奇蹟之歌頌。而倘無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有重大的進步，如何能有經濟上的重大進步？

任何現實社會，必有若干弱點，整個民族文化亦然，有優點弱點，有主流暗流，問題是優弱勢勝？主流是否強於暗流？今日台灣有目共睹是優點弱點，主流強於暗流。當然我們不能輕視弱點暗流，必須虛心檢討，力求改進。而今日台灣的某些弱點，不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問題，只屬教育上的若干問題。

至於王氏所謂的「現代生活」之要求如何如何，試問既成工業化或現代化社會誰個能那麼理想？而大家所熟知的是工業化或現代化社會的墮

落一面，早已令人叫苦，他們正有許多罪惡比台灣社會現實更嚇人。

五、抹煞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

王文說：「在台灣所推行的現代化，則以建立幾個比較現代化的工業或生產單位，及發展一些科技便可以了。」這是什麼話？建立幾個，三或五是也，但僅就十大建設以及繼之十二項大建設，豈只幾個？孫震先生在其「台灣三十餘年來的經濟成就」一文說：「美國康奈爾大學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結構變化』新書，由七位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執筆，其中包括諾貝爾獎金得主顧志耐和瑞典前國家科學院長龍柏格。」這書最後一章，英國的名經濟學家李特說：「台灣有很好理由被列為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美國「讀者文摘」一九七九年七月號刊出：「台灣，一個現代奇蹟」一文說：「前後不到三十年，中華民國不只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到亞洲第二，而且使建國工作成爲世界的輝煌典範。」……。

王文說：「自同光時代起到今天爲止，從沒有從改造文化，建立新的行爲準則，道德規範，及典章制度着手。」……上述引過的陳立夫先生所說的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提倡全國實行新生活運動，胡秋原先生在其「中國文化復興論」中說：「中國了解這個問題者，莫過於孫中山先生，先生關於文化問題有兩個主要教訓：一是要恢復民族自信心，一是要趕上西方的科學。」蔣委員長所提倡的精神運動，也在發揮這個自心力。」再看陳奇祿先生在其「維護固有文化傳統的文化建設」一文說：「先總統 蔣公不但始終遵循着中華文化傳統，而且更積極的倡導中華文化復興，五十五年以 國父誕辰爲「中華文化復興節

」，並訂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方案」。同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蔣公自任會長，領導全國上下全力開展以「倫理、民主、科學」爲內涵的三民主義文化建設。這些年來，文化復興工作諸如對我國古籍的整理，國民生活須知的推行，國民禮儀的獎勵，以及文藝的提倡方面都有了顯著的績效……民國六十七年蔣總統經國先生於當行政院長任內，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說：「我們在十二項大建設中特別列入文化建設一項，計劃在五年之內分區完成每一個縣市的文化中心，隨後再推動長期性的綜合性的文化建設計劃。」……。

六、自相矛盾的詆毀

王文說：「不僅如此，在中國文化與現代化要求衝突激烈，維護及讚美舊文化的聲浪便愈大，而發出這些聲浪的人士常常就是聲音最大，對決策最有影響力的人士。可是社會的演進力量却是阻擋不住的，舊的文化體系，即是以家與農業爲基礎的文化體系仍然在社會演進衝擊之下，逐漸的崩潰與消失。」此所說的舊文化體系，當然是明白指中國傳統文化，這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華民族的命根，真的如王氏所說的逐漸崩潰與消失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否！否！

王文說：「這些人士所能做到的祇有這一點，便是阻止了政府積極從事現代新文化的形成工作……當然，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政府負責經濟發展的官員根本不知道這種深遠的關係，而以工業第一，科技萬能，便可以造成一個現代化中國了。」這豈非又自相矛盾？既然「政府負責經濟發展的官員根本不知道這種深遠關係。」又怎樣會是：「政府積極從事現代新文化的形成工作。」？而領導經濟發展的官員，他們怎會「根本不知道」？

七、自相矛盾的理論

誠然，王氏會說：「我從不輕視中國文化，我也從不主張全盤西化。但是現代化是一個適應過程。」時至今日，並無誰還會反對現代化，上述那些倡導維護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領袖和大師們更不會反對現代化。而王氏既稱不輕視中國文化，爲何要申說「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等於否定中國文化，把新舊社會壞處都一股腦兒推到中國傳統文化身上。這太自相矛盾。

王文說：「這種適應過程，不能太快或太慢，太快或太慢都會產生混亂、挫折，達不到現代化的目標。主張全盤西化者太快了，我們現代化則是太慢了。這又成外行話。因爲這不是快慢問題，而是應否走全盤西化的路之本質問題。因爲所謂全盤西化者，其錯誤是根本否定傳統文化，與王氏一模一樣咬定中國傳統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我們維護發揚傳統文化的人則是認爲中國現代化必須在這尋根固源，維護發揚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努力，現代化才能成功，亦才能創造中國式的現代化，而非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現代化，或不倫不類的半吊子現代化。故王氏所謂「全盤西化者太快了」的話，根本成問題，這句話正好是在基本上說，應走全盤西化的路，只是不可走太快或太慢。不是嗎？照王氏這話，不那麼快的走不就行了，這分明根本還是走全盤西化的路……。

我並非說，中華傳統文化全無可非議之處，不該有所變革，只謂不能基本否定傳統文化，而是在維護發揚作爲中華民族之命根的優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去變革，去適應新情勢，去適應現代化。亦即中華文化是中衰問題，對策是復興而非否定推翻。每一文化必有其優缺點，而其發展過程亦常有盛衰不同時期，決不能因其有缺點有中衰就基本否定推翻，斬斷自己的根。因此這是中

華文化發展與變革的問題，而這必須依自己可能且必要的方式，非可全盤照收模倣他人的，才能創造自己的新文化。我們亦非說，今日台灣現代化過程的現實，無可非議，我們亦認為毛病仍不小，必須力求改進，但決非如王氏所說的那麼不堪，只見其弱不見其強。何況其若干病態，好些正係西式工業化過程中的流弊，非可完全歸罪於傳統文化。我們願意更冷靜說，如果王氏咬定「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並無其他居心，則可能是他錯把中華文化的渣滓部份當其精華，錯以中華文化中的渣滓代表中華文化……。

八、認同與變革

王氏此文最基本的理論是「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故我們只得進一步談認同與變革的問題。且看金耀基教授在其「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歷史」一文中說的：「假如過去中國一百年現代化的試誤過程之經驗對我們有所教訓的話，那就不必把認同與變革觀念放在理論的兩極化上，有時兩者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文化的改革並不能一切從頭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後搬運來應用，文化改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面改出來的。……我們可獲得結論，即「傳統」與「現代」非二個絕緣的隔離體；「變革」與「認同」非兩個相絕的對立體。從而，如何保有傳統以無礙，而且更加強現代化；如何善用認同以不害，而加速變革，乃成為當前歷史文化最重要課題。」其實，遠自希臘時代哲人們已透徹探討過此問題，如柏拉圖是偏重「認同」而輕「變革」的，亞里士多德則以為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亦非必不好的，但變革必須先與系統之本質或結構認同相應。亦即亞氏認為在變革過程中是應該保持認同的。時至今日，如果中國人還不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咬定「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誠難以思議。

如果要再看具體事實，則日本正是最明顯的活例子。日本明治維新的走向現代化，決非全盤西化，決非詆毀否定傳統，決無人喊日本傳統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乃是相反，日本正好盡力在保持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新的變革，現代化始獲成功。而日本文化正早受中國儒家思想重大影響，才產生強固力量得以在外來的猛烈衝擊之下創造自己的新文化。中國則正相反，不少洋迷拼命狂喊反傳統，挖自己的根，要全盤西化，破壞大於建設，以致根傷過甚，一時枝枯葉黃，現代化的進行在前期才那麼慘遭重重挫敗。近百年的血腥教訓還不夠嗎？

有些洋迷之所以至死不悟，仍喊反傳統口號，可能是為了只見工業化之利而不見其弊之大，甚至把這種弊害歸罪於傳統文化作怪。殊不知西式工業化之弊，今正有彼東方精神以濟其窮，所謂東方精神當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為最重要。更恰好王氏此文力數被其認為係形成中國文化基因之一的家之罪，我們正該由這一點說起。我們當然明白工業化使家之面目全非，但個人主義因之泛濫，對家的觀念日益薄弱，亦連國家觀念亦愈趨淡薄，只知爭個人之自由和利益，不知國家社會的大自由和大利害及其尊嚴，終至道德墮落，倫理喪亡。誠如上述陳立夫先生所說的：「此言之，人人憂慮。我們久居美國的僑胞，深知此弊，故亦更愛中華文化。」

最妙的諷刺是：西式工業化社會歡呼個人自由至上，曾幾何時，又出現風行的存在主義哲學，唯苦個人已不存在，變成如同同一工具，如同同一機器零件，消失於大工業，大組織中。「物化」了人生，「物化」了世界，心靈空虛，麻木不仁，這才是真正的「沒有了個人，個人幾乎不存在」。還有可能世人尚較少知的，近年美國的國際貿易已有競爭不過日本之勢，此其因素固甚複雜，但重要一點是日本並不崇洋，力持傳統文化精

神。所以美國個人主義泛濫結果，團體觀念日淡，工人不只較喜罷工，苛求高工資，工作精神亦較低落。日本則相反，工人較與資方合作，對罷工及提高工資要求較為慎重，工作精神較佳，工作效率較高，故出品競爭力逐漸強於美貨。

再看新加坡，李光耀正不斷指出儒家思想特別有益於高度工業化的新加坡社會，中國文化的保持種種傳統美德優於工業化社會個人主義泛濫結果之道德墮落，故提倡加強儒家教育，以健全新加坡工業化社會。日本和新加坡這兩例事實，都多少透露東方精神，儒家思想可濟西方工業化社會之困的端倪。

九、中西文化之異同及其

匯通

要探討工業化或現代化及其與中國文化關係問題，本須從最源頭處看，即從歷史哲學去探清中西文化之異同及其匯通，儘管這裏無篇幅可談此最深奧大問題，但仍可在許多著作中舉一、二以見。

例如，梁漱溟於「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深入分析世界三大文化體系後結論說：「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式：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條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中國文化是走第二條路向，以意欲自為調和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走第三條路向，以意欲返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見五四頁）……拿西洋現在的哲學對他們從古以來的哲學而看，其派頭、風氣、方向簡直都翻轉過來……像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倭鐸等人，大都這樣。……（一七六頁）我這些話是西洋近些年來，為其領路的思想界是怎樣，不知不覺變了方向，並且怎樣很明白的要求改變他們從來的人生態度，而他們要求趨向之所指就是中國之路，孔子之路。……（一七七頁）

質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二百頁）說一句並非鄙薄的話，西洋實在不見得有什麼深厚哲學的人生思想，現在祇為情景露，問題迫來，因而才見得深一層，所以尋到這第二條路上來固屬易易便尋到孔子的路上來亦就不只一家，舉其尤者如羅素，如克魯泡特金，都是的……羅素於此總算很能見於往者孔子着眼所在而抱同樣的用心，所差只是孔子留意問題於無形，而羅素則為感着痛苦乃始要求吧了。」

錢穆在其「中國歷史精神」一書中說：「中國人講『正德』『利用』『厚生』，開物成務是有關利用厚生，還有更重要的『正德』一目標，而且利用厚生亦不是為着爭奇鬥勝。換言之，此仍非人生理想以及人生意義價值之所在。照中國人講法，智力財力的表現並不即是道。中國人講的道，重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齊治平始是入生理想，人生大道。從這一層可以來闡述中國的傳統文化觀。……我暫把人類文化分做兩類型來講，一是向外的，一是向內的，中國文化較西方似是偏重內傾方面……外傾文化只是中國易經上所謂『開物成務』的文化，偏重在物質功利。中國文化之內傾，主要在從理想上創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符合理想，有意義，有價值，有道。……西方人的貢獻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開物成務是向外的，他們的宗教，法律，文藝，哲學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挫折，便會感到無法。而中國文化傳統則重向內，中國社會可以不需宗教法律而維持其和平與安定，中國人生哲理可以不論治亂興衰而仍各有以自全。……漢武帝以後，對社會可獲大利的工商業，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讓私人盡量自由經營。因此對農業則輕徭薄賦，平均地權，對工商業限制發展，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在這種傳統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國始終走不上大富大強之路。然而一個國家亦不

可太富強，太富強了就會有危險。中國的傳統哲學，國防務求能到不被人侵略，經濟求能發展到一般生活無問題。到此為限，不許繼續無限地向前。羅馬帝國的衰亡，原因即在於其太過富強，因經濟集中而流於過度奢侈，遂致文化崩潰，國家消滅。中國始終把文化根苗寄託在農村，不讓財富集中到都市，工商資產始終受節制，求其與農村經濟保持一有寬度的均衡狀態，而限制其發展過度，這樣亦影響到實用科學之發達，使物質文明永遠不能突飛猛進。然就長期歷史進而言，中國的物質文明亦始終在西方之上，只是近兩百年來，西方科學突然凌駕中國。然而西方科學之突飛猛進，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種種嚴重難題。我們不能只看西方今天的發達，而忽視了中國一向用政治來控制經濟那一套理想與方法。自文化立場講，從一個人生理想來規定一種經濟限度，是未可厚非的。」

此外我更願意說，中華文化特別偉大的精神是萬古常新。不是嗎？孔子被稱為聖之時者。「大學」釋新民章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亦是其所以中國不為西化和赤化之震撼所摧毀，不走共產主義亦不走資本主義之路，而走自己的新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路，三民主義的倫理、民主、科學之路。儘管比其實踐過程問題太大，但其理想原則總比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進步，看得比它們更中肯更深遠，展望出中華民族偉大光明的前途。

十、復興中華文化問題

我們要救中國，要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最基本工作仍在復興中華文化。但我們決非說今日台灣對此復興工作已能完全按理想實踐，它的難題

還大，工作更艱，必須有更高的突破。金耀基教授在其「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復興之路」一文中說：「中國文化傳統於過去一百年中，在西方文化之挑激與社會巨變之下已日漸衰微，而在大陸則更遭中共政治權力的摧殘。在這樣一個歷史與時代的環節中，中華民國各界在台灣推行文化復興運動，是有其深遠的莊嚴的文化意義的。但是在文化復興運動中，我們固然也聽到、看到一些清新想法、作法與事物，可是從一概括的觀察所得，却有某種程度流於形式化與口號化。……誠然，文化復興有返本開新之義，也即找回，發掘已隱沒埋葬的思想與事物，使之重現與光耀人間，但其重點決不僅是返本，亦必須在開新。而要返本則必須通過今日我們的需要以及批判的意識與眼光。亦即通過今日現代化的目標之標準，以決定返怎樣的本，開怎樣的新。」

金教授這種批評，雖相當嚴厲，却客觀公正，與我們海外一般僑胞和學人的態度相似，所以我們很欣賞。但我們無法接受王氏「中國文化阻礙國家現代化」之主張。

編者按：李望如先生本文尚有第十一節「重刊刪改自認錯誤」略謂：「在某雜誌重見王作榮先生大作，面目已非，原文之諸多錯誤已改輕不少……證明王氏已自認重大錯誤……」等語，編者為此特電話詢問王作榮先生，據告：「××雜誌文摘欄所載，係該雜誌編輯人員自行摘刊全文要點，決非本人（王氏自稱）自認重大錯誤刪改重刊，本人從不輕視中華文化，從不主張全盤西化。」因此本誌特將李望如先生「重刊刪改自認錯誤」一節刪去，並將王作榮先生「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全文同時刊出，以供讀者參閱。